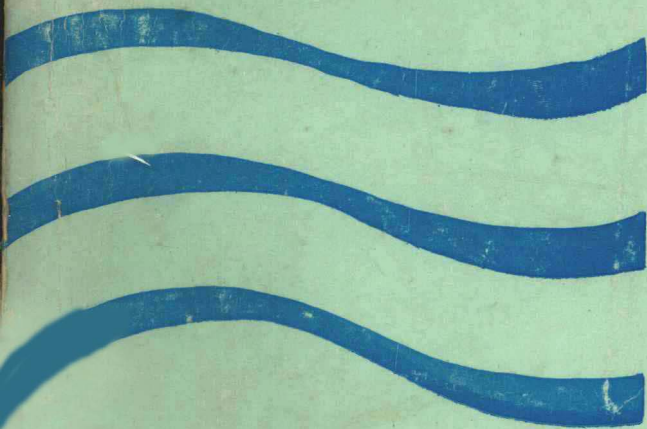


共产国际顾问在中国

翟作君 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共产国际顾问在中国

翟作君 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共产国际顾问在中国

翟作君 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山东泰安师专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6×1168毫米 1/32印张: 7.25字数: 181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 2.90元

ISBN7—80515—368—X/K·43

前 言

近年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兴趣，初步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但由于材料的缺乏和其它种种原因，因此，深入研究还存一定的困难。为了有助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教学及研究工作，特编写了《共产国际顾问在中国》这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是一本资料性的人物介绍书著。本书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地介绍了20年代到30年代与中国革命有密切关系，有过重要影响的12位共产国际、苏联活动家，他们是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加拉罕，孙中山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首席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加伦），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马林，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苏俄政府驻中国全权特使越飞，共产国际驻中国的特别代表罗易，接替鲍罗廷、罗易工作的罗明纳兹，积极支持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米夫、李德，以及苏联东方问题专家马李亚尔。国际人物中有的是共产国际代表，有的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有的是苏联政治、军事顾问和驻华大使。

中国革命从20年代初期开始，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了解这种关系，对研究这一时期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都有重要的意义。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曾向中国派遣了大批顾问，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他们的活动而产生的。这本小册子概括地介绍了这12位共产国际、苏联活动家的思想、理论、著作以及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所参

加的活动和所起的作用。书中还引用了一些过去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材料。介绍和引用这些材料的目的是想对研究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一点素材，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这本小册子中有王惠美、张静星、周玉风分别参加编写了马林、罗易、加伦等人物。本编写过程中虽然吸收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但仍然由于我们掌握的史料有限和水平不高，书中介绍的人物肯定还会有不够完善与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张广勇、山东轻工业学院社科部刘德军等同志的支持，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翟作君

1988.12.1

目 录

1、马林	1
2、维经斯基	23
3、加伦	55
4、鲍罗廷	69
5、达林	112
6、越飞	125
7、加拉罕	132
8、罗易	148
9、罗明纳兹	165
10、米夫	178
11、李德	195
12、马李亚尔	218

马 林

(一)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 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马林在荷京大学读完政治经济课程以后,于1900年到荷兰铁路上工作,在铁路工会中表现了突出的战斗精神,成为铁路工会的一名斗士。1902年,马林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被派往荷属东印度群岛去宣传马克思主义。1914年5月,马林参与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不久,这个组织就同当地有悠久历史的政党——泛伊斯兰教联盟合作,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互相加入并保留原有政党身份。在马林等人的积极活动下,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逐渐渗入到了泛伊斯兰教联盟委员会的核心中去。1915年,马林创办了荷兰文的《自由呼声报》,1918年创办了印尼文的《人民呼声报》。由于他多次著文欢呼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抨击荷兰政府的殖民统治,1918年12月被当局驱逐出境,于1919年初回到荷兰。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荷属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于1920年5月23日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更名为印尼共产党。在这以后,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了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会议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马林作了发言,他除了介绍了他在爪哇实行两党党内合作的经验和所取得的成绩外,

还对列宁在二大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罗易起草的补充提纲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列宁同志和罗易同志的提纲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解释是一致的。困难只在于对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① 他还建议：“在这里通过的提纲，由共产国际用几种东方文字印刷，特别在中国和印度的革命者中间分发”，“应该为远东也为中东建立共产国际宣传机构”，他提出“共产国际给远东领导人以机会，让他们在这里（指苏俄）生活六个月，并学习关于共产主义的课程，以使他们在殖民地能在实际上实现苏维埃式的组织和完成共产党人的工作。”他说：“我这样要求是因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已成为东方人的新的麦加，而资产阶级政府则全都企图阻止共产党的朝圣者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来；我们应给东方革命者在苏联学习理论的机会，以使远东能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有朝气的成员”^②。

20.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马林被委派为驻中国的代表，于1921年4月从欧洲取道苏伊士运河前往上海。

1921年6月3日，一艘意大利海轮阿奎拉号驶入上海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正在这条船上，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中国，开始执行他的使命。但由于马林在动身来上海前途经维也纳时曾被逮捕，虽经过6天被驱逐出境，但维也纳警方把他的护照交与外事局，而外事局又向马林将去的国家和地区都发出了通告，因此，马林在科伦坡、新加坡、香港等各港口都受到了英国当局的严格检查。而且荷属东印度政府又同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取得了联系。由于这种种原因，马林已不可能作为密使到中国来进行革命活动，而只能以公开的身份进行活动。马林来华的主要任务是除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外，还负责考察远东各国情况，建立联系，并调查是否有可能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问题。

(二)

马林到达上海时，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济南、武汉等地都已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核心，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为使中国早日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以后，就具体着手帮助中国建党。马林来华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柯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以接替魏经斯基的工作。在上海，他们了解了各地的建党情况、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和初期工人运动的情况后，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马林派遣了年青的共产主义者张太雷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就分别与在北京的李大钊和在广州的陈独秀取得了联系。马林在北京和李大钊及北京的党员见了面，建议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的党员都表示同意并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随后，马林便由张国焘陪同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等商量筹备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马林的建议，负责筹备工作的李达分别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共产主义小组(或党员)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大会。

经过紧张的筹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上海法租界贝勒里3号(即今兴业路76号)开幕了。这里原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公馆，不大的小客堂里坐了十几名代表。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上海代表李达和李汉俊；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北京代表刘仁静和张国焘；广东代表陈公博；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日本留学生中的党员代表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马林、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马林出席大会是标志着共产国际

对建党的支持，对代表们起了鼓舞作用的。

在第一次会议上，马林作了热情的发言，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党添了一个东方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③会上，马林又分析了国际形势，介绍了第三国际的工作情况和他在爪哇建党活动的情况和经验，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马林虽是荷兰人，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声音洪大，讲话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吸引了到会的代表。

根据马林的建议选出了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在7月25日26日二天中起草纲领和计划。纲领讨论的基础是由张国焘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这个宣言在“一大”前夕马林曾经看过，并对这个文件理论上、原则上正确的地方表示赞同，对不妥的地方提出了比较严格的批评，同意将它作为党纲讨论的基础交给大会。经过比较周密的修改，吸收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个党纲草案的长处，又参考了俄、英、美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拟订出了供大会讨论的党纲草案。又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马林虽然没有参加讨论，但通过张国焘的联系，了解了代表们争论的问题，他支持了多数人的主张，使“一大”纲领中关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对有争执的部分条文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到会了。原订议程是由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但会议开始不久，突然从后门闯进了一名中年男子，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捏造了一个名字，然后说“找错了地方”就急忙走了。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机警地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员分头离开，会议改时间改地点再继续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

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都立即离开了会场。果然，十分钟后，法国巡捕房就包围了会场，并入室搜查，结果扑了空。李达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④。

这件意外的情况发生以后，经过部分代表的商量决定将会址移至嘉兴南湖，雇了一艘大亚舫，在风景优美的南湖上以游湖为掩护，顺利地完成了大会的最后议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定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建设中国共产党，并选出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规模虽然不大，代表人数也不多，但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宣告了一个完全新型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式成立。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起了核心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林根据他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建议党要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一建议。1921年8月，在马林指导下，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随后，又在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设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部。马林还多次去各地实地考察工人运动，并给予了指导。这个书记部领导了20年代中国许多重要的工人斗争。

(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林遵循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加紧工作，以促成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

早在1920年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就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和殖民地半殖

民地和落后国家未来的共产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建立新型政党的组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但不能同他们“混为一体”，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⑤。列宁的思想正指明了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应采取的基本方针。

所以在完成了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任务后，马林便致力于谋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在马林来到中国之前，对统战对象问题在共产国际一些人员中是存在着分歧的。1920年—1921年间，只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了解一些中国的动态。远东局人员在中国寻求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几乎在同一时期与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等都有接触，并且对吴佩孚、陈炯明更有好感。远东局和赤塔共和国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⑥。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访问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后，一度曾“决定联合吴佩孚发动民主运动”，同时苏俄《消息报》也载文称吴佩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已经在中国正在发展的局势中树起了新的旗帜”，而对吴佩孚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另外，苏俄政府曾于1920年4月29日派路博将军携带列宁的亲笔信到粤军驻地漳州访问陈炯明，表示苏俄愿意帮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1921年底，维经斯基又曾在南宁和陈炯明“长谈三次”，说陈炯明完全支持俄国革命，当时苏俄人民外交委员出版的刊物甚至称赞陈炯明是“坚信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位革命的将军，而且具有优秀的组织能力，并受到群众的拥护”。

因此，马林初次来华时，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而没有专门给他什么指示。之所以没

有专门指示，是因为只有伊尔库次克局了解一些中国动态，伊尔库次克局全都是俄国人。马林认为“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伊尔库次克局只与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动仅仅受俄国在华北的利益所支配”⑦。基于这样的情况，马林认为“我必须从头做起，在北京，那时有俄国使团的一些代表，有苏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人员等等，他们与北京大学一些小组有接触。而在上海，我不得不从了解中国情况入手，这使我同那里的国民党总部发生了接触”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马林开始同上海国民党中央机关进行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党员张继。张继是中国第一届国会的议员。作为孙中山的人，曾在国会内积极反对向外国借款。在接触过程中，马林认为张继比他曾遇到过的任何一个人政治上更成熟，并具有更多的西方观点。由于同张继的接触，国民党邀请马林去会见孙中山。此时孙中山正在广西组织北伐，马林便由担任翻译的张太雷陪同于1921年12月下旬乘岳阳轮由上海去汉口，又从粤汉路南下途经湖南前往广西桂林。12月23日薄暮时分，马林与张太雷抵达桂林，当晚，住在广西银行。孙中山就在他的住处——旧桂王府热情地接待了马林。

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旧民主主义革命已彻底失败。孙中山在饱经挫折之后，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即容忍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的状况，任凭军阀横行、列强宰割呢，还是坚持为谋求国家独立、民主和统一而奋斗？孙中山勇敢地选择了继续奋斗这一道路。因此在他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就下令进军广西，继而决定出师北伐，消灭北洋军阀。但是广东新军阀陈炯明却和北方曹锟、吴佩孚暗地勾结排挤孙中山，反对北伐。于是孙中山于12月4日抵桂林，设大本营于桂林皇城旧桂王府。孙中山正总结过去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探求改造中国的新途径。马林在这时与他会晤，不啻雪中送炭。

马林到桂林后，在孙中山的大本营中住了9天，双方进行了多次深入的长谈，张太雷参加了会谈，另外国民党的主要人物邓家彦、许崇智、孙科、陈少白、林云陔、曹亚伯、朱卓文等也参加了会谈。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同时又着重讨论了国共两党结盟的可能性和国民党与苏俄建立联盟的可能性。后来，马林把他同孙中山的讨论要点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中国的复兴与对俄关系》。在这份备忘录中提到了他与孙中山会谈的内容要点：“第一，华盛顿会议意味着列强之间战争的推迟，列强合作的现实将使中国和俄国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这就使中国和俄国需要为相互维护而彼此合作。第二，在中国建立一个具有独立的、强大的集中统一的政府，这并不是一件纯属本国的事务，而且有着直接的国际重要性。第三，建立这样一个政府需要进行‘纯粹的民族主义的’的宣传，只有通过这样的宣传，才能使国民党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完成自身革命任务’的政党。第四，当着既不能期待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帮助，也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国家中立的情况下，证明只有俄国强有力地支持着‘落后国家’的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第五，这意味着中国革命政府应当尽快地同俄国达成谅解，以增强自己的地位。假如与俄国签订条约，这将使中国人民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南方的运动，看出南方运动同其他交战中的军事领袖的区别，最后，假如这个步骤（指与俄国签订条约）还不可能实现，应派出代表团到莫斯科以建立秘密联系。”⑨

在此以前，孙中山虽然对俄国革命和它的经验十分关切，但是对苏俄能否在沙皇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烂摊子上建设共产主义是很疑虑的。听了马林的介绍以后，他了解了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成功，而这成功正可证明他自己的坚持平均地权和发展实业的计划“一定能够实行”，马林的介绍使孙中山迫切地希望向苏俄学习。

在会谈中，马林还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

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立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的基础；三，促进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孙中山在会谈时，尽管强调了中国国情与俄国不同，但是对苏俄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对马林的建议还是很感兴趣的。

马林在桂林的几天，成果丰硕，对孙中山晚年确定的三大政策起了促进作用。“以俄为师”的观念在孙中山思想中日益明确，也可以说这次会谈是孙中山“联俄的起点”^⑩。孙中山在与马林会谈以后也在旅桂广东同乡欢迎会上演说时明确指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⑪。另外，孙中山对工农的困苦也由怀着深挚的同情转而为采取行动积极扶持，在与马林会见后不久，即以大总统名义公布暂行工会条例，积极赞助当时的香港罢工，并主张在广州市议会中有工人代表。马林与孙中山会见后，对孙中山有如此的积极影响，实际上也为后来的国共合作的建立，开辟了道路。随后，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广州，这时正是1922年初，香港爆发了海员大罢工。马林通过实地考察，对国民党对海员罢工的支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林在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到：“在今年正月海员罢工期间……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们所领导，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他认为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不可少的人。同时，马林在广州时还同陈炯明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尽管陈炯明在口头上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还表示支持苏俄革命。但是马林发现他不如孙中山，认为他是民族主义，只局限于广东一省。因此，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能与之合作的不是陈炯明，更不是吴佩孚，而是孙中山。经过对中国南方的实地考察，马林对国民党的性质和成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他感到南方的工人运动已经迅速发展，而上海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开展起来，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同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中国革命迅速发展。

马林在结束了他的南方之行后，便去北京与苏俄公使裴克思商谈，他提交了两份关于中国问题的初步报告，请裴克思转交莫斯科。第一份文件是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二份文件是给苏俄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会的，主要建议委派一位苏俄使者到中国南方。“这些建议后来均被俄国人采纳实行了。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越宣言》，同时9月派鲍罗廷为苏俄政府驻广州的常设代表”^⑫。

1922年3月29日，马林离开北京返回上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商讨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关门政策”，直接加入国民党，以便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马林在与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等讨论中国党和工人运动的前景时，坚持了这样的观点：赤塔政府对待吴佩孚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海员罢工和国民党的领导证明民族主义运动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到那时为止，工人阶级活动的最强烈表现是香港罢工；国民党领导集团方面对群众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相联系的重要性缺乏理解，这是中国反帝力量在发展民族主义运动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形式使得在党内很容易促进群众运动的思想；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人应该利用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他们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⑬。

虽然根据马林自述“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观点”，但陈独秀明确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陈独秀认为：“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的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联张作霖、段其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发表过党纲，除广东以外，全国仍视它为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

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甚烈，中共若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故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孙中山不能容纳新加入者的意见和假以权柄；六，各地区共产党员均以开会决议，绝不赞成加入国民党。”^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很快就接受马林的意见。于是，马林决定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以便取得共产国际领导的明确支持。1922年4月23日马林从上海乘日本轮船鹿岛丸号前往新加坡，经马赛、阿姆斯特丹、柏林等地于7月上旬到达莫斯科。

7月11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具体叙述了他来华期间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了解和认识，并对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他在报告中对中国工人阶级是这样分析的：“除了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之外，只有广东工人团结在现代工会组织之中，中国的旧式工人组织、行会、秘密结社——如上海的青、红帮之类，与其说是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一种助力，勿宁说是一种障碍。现代工业工人的人数仍然很少。现代工业在外资特殊帮助下，虽然发展很快，但产业工人却只占中国人口总数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他也指出一些外国统计资料估计中国产业工人有四十万。“从上海和香港两地的情况来判断，这个估计太低了”，而且“因为贫苦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工人“普遍地和农村家庭保持着联系”。对于中国的农民，马林认为“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他们无可奈何地在各式各样的军阀混战中受煎熬，这些战争是年轻的中华民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分析了中国的阶级状况后，马林认为“目前时期中国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政治领导。”

马林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国民党，他说他在和好几位领导人谈话后，发现国民党中有四类成员：即一，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在我（指